

历史文献研究

总第26辑

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



ISSN 1555-5718

历史文献研究

[总第26辑]

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

LSWXYJ

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07年•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文献研究. 总第 26 辑/周国林主编

—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5622-3646-7

I. 历… II. 周… III. 历史-文献-研究-中国-丛刊

IV. K207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5105 号

历史文献研究 (总第 26 辑)

© 周国林 主编

主 编: 周国林

责任编辑: 李晓明

责任校对: 许 刚

封面设计: 甘 英

编辑室: 文字编辑室

电话: 027-67863220

出版发行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©

社址: 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00 号

电话: 027-67863040 (发行部) 027-67861321 (邮购)

传真: 027-67863291

网址: <http://ccnup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scbs@public.wh.hb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督印: 章光琼

字数: 338 千字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 13.5

版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 册

定价: 24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 欢迎举报盗版,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-67861321

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
编辑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瑞明 邓瑞全 来可泓 李晓明 杨 昶 张新民
周少川 周国林 郝润华 顾志华 曹书杰 戴南海

主 编 周国林
常务编委 李晓明

编委会通讯处:

邮 编: 430079

地 址: 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

电 话: (027) 67868294

电 邮: zhou2669@126.com 或 god001@126.com

目 录

张舜徽先生“文献学四书”述义·····	周国林(1)
《竹书纪年》综论·····	曹书杰(11)
略论文献学学科的多途发展·····	张子侠 张永瑾(46)
《礼记·曾子问》成篇年代考·····	王 铨(59)
汉籍早期传入日本诸说考略·····	李春光(66)
郭璞《尔雅图赞》的辑佚问题·····	周德美(82)
《春秋后语》与东晋南朝编年体史书·····	郝润华 王照年(96)
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·····	谢贵安(109)
宋代“讲史”与史学的社会化·····	李传印 邓 锐(129)
试论正史《儒林传》的学术史特性·····	周春健(143)
李焘进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之时、次、卷、册续探·····	汤江浩(157)
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·集部》分类、体例的价值探析 ·····	柳 燕(171)
焦竑著述考·····	杨 昶 史振卿(180)
释德清《道德经解》要旨解读·····	韦东超(200)
明清商书文献考略·····	张海英(220)
清代史馆征集资料的途径与方法·····	王记录 刘海静(237)

简述汪中的经学成就..... 董恩林(250)

张际亮与《南浦秋波录》..... 戴显群(266)

张善浩诗文集版本略考..... 李 鸣 马振奎(273)

标点本《十三经注疏·仪礼注疏》标点献疑之二

..... 彭忠德 王旭送(280)

《四库提要叙讲疏》的学术价值..... 林久贵 黄 娇(297)

国学大师的风范

——记最后一位朴学家张舜徽先生..... 刘重来(306)

炎黄时期南北强弱之转化及战争的起因、地点考析

..... 郭伟川(315)

汉唐文献与汉唐时期山西的粮食资源..... 邓瑞金(328)

索水源流考..... 陈万卿(335)

近 80 年傅玄研究概况 李晓明(351)

中国古代礼学研究的新成果

——评丁鼎教授校释的《新定三礼图》..... 郭善兵(366)

明代士绅编撰佛教方志动机再探

——兼评卜正民《为权利祈祷——佛教与晚明中国士

绅社会的形成》..... 曹刚华(377)

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刊总目录(总第 1—25 辑)..... (391)

张舜徽先生“文献学四书”述义

周国林

张舜徽先生毕生潜心学术，是 20 世纪后半叶成就最卓著的历史文献学家之一。他博治四部，为学不尚空论，以文献为根基，故著述不受时空局限，历久弥新。在文献学领域，他的著述也相当宏富。张先生在《八十自叙》中说：“至于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平生致力于斯，所造亦广。若《广校讎略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、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、《汉书艺文志释例》、《四库提要叙讲疏》诸种，固已拥彗前驱，导夫先路。”^①这段话，张先生是在按四部分类列举平生著述后所言。在近几年整理《张舜徽集》的过程中，我们深感张先生著述中文献学特色之浓厚。《清人文集别录》一书，张先生自己将其列入集部，那是就研究的对象而言。如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，也的确是学术界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学名著，还可看作是他实践自己文献学理论的一部示范之作。从文献学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，我们认为最能代表张先生文献学成就的经典之作，当推《广校讎略》、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、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四书。后学欲入文献学之门，或评论张舜徽先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的成就，这四部书大概是要重点关注的。现略述四书著述缘起和大义于下^②。

一、简述《广校讎略》

《广校讎略》是张先生平生第一部专著，是他三十来岁时治学的心血之作。他幼承庭训，研习古代文史。后负笈北平，得姑丈余嘉锡先生提携，日入北海图书馆披览群籍，广识学界名流，逐渐形成博通的治学观。在担任多年中学文史教员后，1942年9月，到位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的“国立师范学院”任教。工作之余，他整理历年笔记和心得，写成《广校讎略》一书。初版自序有云：

舜徽少时读书，酷嗜乾、嘉诸儒之学，寝馈其中者有年。其后涉猎子史，兼览宋人经说，见书渐广，始欷然不自慊，泛滥群籍，于汉、宋诸儒，独宗二郑，以为康成经术，渔仲史裁，譬诸灵海乔岳，无以益其崇深。两家涂辙虽殊，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……舜徽愚弩，才识不逮古人万一，固已慕其所为而深服膺之矣。

心仪二郑如此之深，故早年读书论文之作，便仿效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之体加以铨次，凡一百篇。全书内容，“首正校讎之名，次辨著述之体，复厘析乎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浅深之故”。

郑樵的《校讎略》，谈的是文献整理、收集、分类、编目之事。至清代，章学诚著《校讎通义》，提出“校讎学”概念。张先生上承郑、章通人之学，主张通常所言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之学，皆属校讎之事，“但举校讎，自足该之。语其大用，固在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。

张先生关于目录版本校勘不必独自称“学”的观点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。不过，这一点并不重要。他称举校讎的大名，旨在强调三者的联系，达到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目标，这一

学术宗旨，是大家都认同的。他关于文献学的若干理论建树，便是他上推校讎古义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辨成果。诸如著述体例、著述标题、作者姓字标题、援引古书标题、序书体例、注书流别、书籍传布与散亡、簿录体例与部类分合、校书方法、辨伪辑佚、汉唐宋清之学术，书中皆有论列。如《著述体例论》中，论述自古以来载籍当区分为著作、编述、钞纂三大类，有助于人们认识各类典籍的本末先后、高下浅深。又如卷五《汉唐宋清学术论》18篇，论述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、郑玄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、经师家法亡于东汉、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者、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、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、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、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、宋人经说不可尽废、宋世私门校书之盛、清代兴起之师、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、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、道咸以下清学渐衰、道咸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与模拟著书之非、群经新疏未必尽善、专精与博通之辨，实际上是一部提纲挈领的文献学史。从汉至清二千年中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状况，大致呈现出来。可以说，张先生首正校讎之名，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。

《广校讎略》于1963年重印时，增附录三篇。其《自序》补记有云：“又尝以为校讎之学，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，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；次必推明传注之例，而后勘正文字无臆逞之失。古人著述不言例，而例自散见于全书之中。后人摘绎遗编，多为之方以究得例，信能执简驭繁，持类统杂，施之初学，尤为切要。”所附《汉书艺文志释例》、《毛诗故训传释例》、《世说新语注释例》，便是张先生摘绎遗编时所“穷得其例”者。

《广校讎略》一书，奠定了张先生一辈子治学的趋向和气象，后来的著述，不少都与此书关系密切。1962年出版的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一书，便是摘取此书中校勘辨伪辑佚诸篇之义，发挥、拓展而成，张先生自己便认为“今二书可并行焉”。

二、简述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(附《四库提要叙讲疏》)

西汉末年刘向、刘歆父子校理群书，是古代规模空前的一次文献整理工作。虽然他们的辛勤成果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没有保存下来，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白做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就得益于西汉末年的这场学术盛举。当然，班固的文献著录，虽前有所承，仍付出了大量心血。对于班氏之作，张舜徽先生非常重视。他认为汉代人的著述，有五种必须精熟以为纲领。他在《通释》的自序中说：

不精绎《太史公记》，则无以探史学之源；不详究《淮南王书》，则无以知道论之要；不通《论衡》，则不能广智；不治《说文》，则莫由识字。又必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溯学术之流派，明簿录之体例。精熟此五家之书以立其基，而后可以博涉广营，汇为通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为书短简，尤治学之纲领，群书之要删。如能反复温寻而有所得，以之为学，则必有如荀卿所云：“若挈裘领，诎五指而顿之，顺者不可胜数也”。

因此，他自少便好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常置案头，时加笺记。1946年秋，他在兰州大学任教，便以是书为教材。至晚年重温是书，复有笺记，于是整理成编，名为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。

《通释》采用循文通释方式，即先逐句列出《汉志》原文，再加以考释。具体内容据《自序》介绍，有四个方面，即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，悉甄采之，句读之有误者正之，史证之偶疏者补之，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”。崔曙庭先生曾撰作专文^①，对这四个方面的成果予以评述。根据崔文统计，张先生采录有关注释《汉志》的学者有60多家，其中清代学者占大多数，清代以前者

10 多家。60 多家中，征引最多的是颜师古、姚振宗之注（颜注 135 条、姚注 137 条）。将前人的成果充分汇集起来，无疑有集其大成的作用。

在“句读之有误者正之”方面，主要是针对《六艺略》中几部经书的断句而言。如《六艺略》一开头，就对通常标点“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”提出异议，认为“此应读《易》字自为句，乃冒起下文之辞。”做了一番论证后，又推导“经”的本义，随之又解说“经十二篇”的篇名和内容、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，“施、孟、梁丘三家”的盛衰。这种正读及立足于史实的疏证，比一般的文字疏通无疑更便于读者。

“史证之偶疏者补之”，就是引用新的史证，加以详细解说。这方面，以《六艺略》和《诸子略》最为详赡，约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。如《诸子略·道家》中，有《管子》一书。《通释》从《管子》篇章的确定、历代学者的评论，说明《管子》不是个人作品，是他人采掇管子言行汇集之作，最后又论证班固何以将《管子》归入道家的原因，在于“多言无为之理，详于人君南面之术”。可谓直抒己见，要言不烦。

“间附论说以评断之”就是评论，也可称为论断。如《六艺略·诗》中“《韩内传》四卷”条下，《通释》引述了王先谦及杨树达二家之说，接下来便加以评论，认为杨氏“《内外传》合而为一”之说是正确的，又对杨说加以补充以论证其正确性。这样，就使读者对于《韩诗外传》的了解更为清楚明确了。在评论中，大量使用出土文献，是一大特色。

经过以上四方面的考释，中国早期文化典籍的面目更为清晰。考释过程中深刻的文化见解，尤其值得读者思索。

与《通释》体例相同、可以参照阅读的，是《四库提要叙讲疏》一书。1947 年，张先生在兰州大学讲授“国学概论”，取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》四十八篇为教本。讲授结束后，自录所

言，述为《讲疏》（刊载于齐鲁书社1988年版《旧学辑存》）。其自序有云：

昔张之洞《輶轩语》教学者曰：“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读一过，即略知学问门径矣”。余则以为此四十八篇者，又门径中之门径也。苟能熟习而详绎之，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，诸史体例之异同，子集之支分派衍，释道之演变原委，悉瞭然于心，于是博治载籍，自不迷于趋向矣。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。首取《提要》本书以相申发，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藉资说明，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。

这段话，已经将《讲疏》的写法和内容讲得很清楚，其中对“群经传注之流别，诸史体例之异同，子集之支分派衍，释道之演变原委”的强调，照例体现了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宗旨。本辑会刊中有林久贵、黄娇二人合撰专文一篇，可参看。

三、简述《中国文献学》

《中国文献学》成书于1981年，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。是书之作，完全是为适应时代的需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学术界迎来“学术的春天”。1979年，张舜徽先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，不久又为所在单位争取到研究生学位授予权。在成为当时历史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后，理论建设的任务便摆到面前。凭着多年深厚的积累，他很快便拿出了一部当代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。

《中国文献学》分12编、60章。与先前及同时代的同类著述相比较，这部书不仅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，也不仅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，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，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

理文献的业绩，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。

如果说张先生早年是从推导“校讎”古义展开论述的话，那么他晚年之作则从论证“文献”本义而开展理论探索。张先生认为，文献学的范围，包罗本广。他采用梁启超“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”之说，指出文献学的基本工作绝不仅仅是校勘、注释古籍而已。在漫长的封建朝代，无所谓文献学，整理、研究历史文献的学者被称之为校讎学家，历代有大名的校讎家就是贡献较大的文献学家，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。当今文献学工作者，自然应该继承过去校讎学家们的方法经验，对保存下来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，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、系统化，古朴的文字通俗化、明朗化，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条别源流，甄论得失，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。具体说来，比较迫切的任务有甄录古代遗文、改造二十四史、整理地方志书、融贯诸子百家四项。而整理文献更重要的工作，还在于与研究相结合，从繁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，剪裁熔铸，编述为内容丰富的通史，广泛地为社会服务。很显然，张先生希望当代的“文献学”，要比过去的“校讎学”取得更高的成就。

据是书前言，张先生有“他日增补”之意。后又在为他人著述的“题辞”中说：“余往岁虽有《中国文献学》之作，特发凡起例而已。甚望年富力强之人，扩充而补苴之。”^④

张先生晚年有好几篇文章，都对当时刚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通达的见解，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。这也属于他晚年构建文献学理论的具体工作。他最基本的主张，是强调整理古籍不仅仅是标点注释校勘，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、总结性的论著，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、编述、注释、钞纂四个方面^⑤。一句话，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，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。

理论探索的同时，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《文献学论著辑要》，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论凡百二十目。其自序中指出：“整理文献，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，诸史记载之异同，子集之支分派别，辨其原流，明其体统，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，审版本之先后；旁及校勘、目录、辑佚、避讳诸端，皆当洞达其理，庶几有着力处。若于此类全无所知，遽谈古籍整理，将见其昏昏冥冥，不解何从下手也。”^⑥《辑要》之作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籍整理者“何从下手”的困难。这部书可视为《中国文献学》的辅助读物。

四、简述《清人文集别录》

对于清代学术成果，张舜徽先生相当熟悉。他早年有改修《清史》的志愿，因之搜求清人碑传及文集、笔记广泛阅读。后来志愿未酬，而从过去读书所得笔记中整理成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诸书。

从20多岁到50岁期间，尤其是40多岁前后，张先生大量阅读清人文集，所寓目者有1100多家。之所以如此勤奋，缘于张之洞的清人文集“实用胜于古集”之说。张舜徽先生认为张氏之言是矣，而意犹未尽：

盖自乾嘉盛时，朴学大兴，而诂经、证史、议礼、明制、考文、审音、诠释名物之文，最为繁富，苟能博观约取，为用尤弘，又不啻为经、史、小学、群书之羽翼矣。舜徽自少治文字、故训、声韵之学，后乃进而理董群经、诸子及历代史籍，恒旁稽清人文集、笔记，以博其趣，释疑祛惑，受益实多。今于辨章学术之际，凡诸家考证之语，论断审密，信有发前人所未发者，亦特为拈出，以与学者详之。

对于所读文集，他随手勤做笔记，写出 600 多篇叙录。后来，从中选出 600 篇，汇为一书，“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，然而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，多在其中矣。”

600 家文集的叙录，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，从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直到清末民初的刘师培。有时，也适当考虑学缘（部分人有血缘关系）与地缘关系，将有关联者的叙录放在一起，以见学术的传承与相互影响。各篇叙录的写作，大体都有如下要素。一是致详作者生平，以为知人论世之助。二是记书中要旨，核其学识之浅深。这是叙录中最核心的部分，是在对文集投入心力后，从其代表性言论对作者学识的评述。三是介绍文集的篇章结构和版本情况。这部分介绍相当扼要，但足以让读者对文集各部分内容和版本情况有个基本了解。

对于这部书，张先生有着自己的期待：“妄欲附于校讎流别之义，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。”因此，各篇叙录的写作，他不仅是就一人的文集简要的介绍，而是将其放在一代学术兴替的背景下去观照，去解说，以个别去体现一般，去丰富一般。略加条理，以下几点尤为突出。一是从总体上把握清代学术流变，二是以联系的观点展现学术的传承和影响，三是以比较的方法鉴别学识之高下与途辙之异同。这样的写法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我们曾专文叙述^⑦，有意者可参看。

以 600 篇叙录，生动而具体地、全方位地显示清人的学术成就与演进历程，《别录》已不是一般的提要，而成为研究清代学术文化的成家之著述。前辈学者顾颉刚先生评价此书“启牖之功，实在张香涛《轺轩语》、《书目答问》之上”，称赞张先生“别白是非，指明优劣。上绍向、歆之业，下则藐视纪昀之书，其发生影响之大，固不待言也。”^⑧

张先生涉览清人笔记的成果，收录于《清人笔记条辨》中。是书的条辨方式，是叙录的一种变体，也可以说是叙录的一种创

造性运用。其中辨章学术、考论经籍、证说名物制度、订正文字音义、品定文艺高下者，皆足见张先生文献学功力之雄浑深厚。是书可与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对照阅读。

以上简说，意在从张舜徽先生的著述中，为学习文献学者提出几部最值得钻研的案头必备之书。是否得当，尚请学界同行及同门教正。

① 张舜徽：《切庵学术讲论集》第909页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。

② 所引四书皆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不另注。

③ 崔曙庭：《张舜徽先生〈汉书艺文志通释〉的目录学成就》，载《张舜徽学术研究》（第一辑）第207-218页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④ 张家瑛、黄宝权：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“题辞”。

⑤ 张舜徽：《切庵学术讲论集》第123-134页。

⑥ 张舜徽：《文献学论著辑要·序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⑦ 周国林：《清人文集别录评介》，载仓修良主编《中国史学名著评介》第五卷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⑧ 张舜徽：《切庵学术讲论集》第406页。

（本文作者周国林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
《竹书纪年》综论

曹书杰

《竹书纪年》是西晋武帝时期出土的一部成书于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先秦通史，因其是编年体，故当时的整理者定名为《纪年》；因其出土时是简册本，故后世通称为《竹书纪年》；因其出土于汲郡古墓王陵，又称《汲冢纪年》或《汲冢竹书纪年》、《汲郡竹书纪年》，他如文献引称《汲郡古文》、《汲郡竹书》、《汲冢竹书》、《汲郡地中古文册书》等，也指《竹书纪年》。

先秦诸国史记经秦始皇焚书几乎彻底毁灭，《纪年》作为战国魏国史因陪葬地下而在晋初得以再现流传，故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无缘见到此书，其所载内容往往与儒家传统说法不同，也自然与《史记》颇多不同，所以其史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，但也受到保守派的排斥，唐代以来少有流传，似乎在存亡之间，或以为全部亡佚。《纪年》现行的两种本子，一是辑录历代征引《纪年》文段而成的辑佚本，即所谓的《古本竹书纪年》；一是明代嘉靖年间范钦刊行的两卷本，即所谓的《今本竹书纪年》。

一、《纪年》的发现和流传

西晋武帝时，汲郡（今河南汲县西南）有个盗墓人——不准，盗掘魏王的墓冢，其中有陪葬的“竹书数十车”，不准并不认识它的价值，遂不以为意，竟然点燃竹简照明，事情败漏，